

批林批孔学习材料

——关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概况

(根据记录整理, 仅供参考)

一九七四年九月

目 录

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儒法斗争	(3)
1. 春秋末期少正卯等法家先驱者同孔丘的斗争.....	(4)
2. 战国初期到中期商鞅等法家同孟轲等儒家的斗争.....	(11)
3. 战国末期荀况、韩非对孔孟儒家的批判和秦始皇、 李斯反对吕不韦复辟集团的斗争.....	(19)
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社会中的儒法斗争	(28)
1. 秦统一中国后到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	(29)
2. 西汉后期到隋唐时期的儒法斗争.....	(37)
3. 两宋时期的儒法斗争.....	(51)
4. 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58)
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	(68)
1.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儒法斗争.....	(69)
2. 辛亥革命和儒法斗争.....	(71)
3. 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反对复辟帝制和儒法斗争...	(75)
四、几点体会	(8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总结和研究我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和特点，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的中国，而且“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把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更系统化地进行下去。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们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反映。儒家和法家是在我国春秋末期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急剧转变过程中，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两个对立学派。儒家是代表当时没落的奴隶主利益的一个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进步学派。儒法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两个阶级、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以后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改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儒家一直为反动统治者所尊奉，把它捧上了天。儒法斗争虽然始终没有停止过，法家思想也一直为社会进步力量所继承和发扬，但法家学派却长期被反动统治者所排斥和咒骂。儒法斗争的历史及其阶级实质被严重地歪曲、颠倒。

就是到今天社会主义时期，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等一伙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还是在大肆吹捧儒家孔孟之道，恶毒攻击和咒骂法家思想。他们都是一批孔孟的忠实信徒，地地道道的儒家。他们尊儒反法完全是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变中国为苏修殖民地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分析和总结儒法两条对立路线斗争的历史，充分揭露儒家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本质，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肯定，把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对于当前彻底批判和深刻揭露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狠打击帝、修、反，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对历史上一切反动的文化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不这样就不可能做到两个彻底决裂，就不可能取得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同时，我们对历史上的优秀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点，具体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研究法家著作，批判孔孟之道，继承法家传统，正是当前深入反修防修，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下面我们分三个历史阶段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概况。

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 转变时期的儒法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更加激化,奴隶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起义暴动。到春秋末期,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赶跑和杀掉了不少奴隶主贵族。如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所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有“从卒九千人”。他在当时“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闻风逃窜,不敢抵抗。这种奴隶暴动和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摧毁奴隶制的决定力量。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同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反映为儒法两个对立学派的斗争。这两个学派斗争的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

儒家是代表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个反动学派。它推行一条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一切新生事物,顽固地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度的反动的政治思想路线,鼓吹和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先验论和天才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由于他在年轻时从事过“儒”的职业(给奴隶主贵族办丧事,当吹鼓手),所以称这个学派为“儒家”。同儒家对立的是法家,它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个进步学派。它宣传和实行一条变革旧制度、发展新制度、反对旧传统、支持新生事物,坚持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路线。因为这个学派主张“法治”,所以后人称它为“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同儒家的斗争,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期。这一时期,奴隶制急剧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以少正卯等为代表的法家先驱者积极宣传变革思想,为建立封建制大造革命舆论。他们主张废除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礼治”,实行“法治”,积极支持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夺权斗争,因而同主张“克己复礼”,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第二阶段是战国初期至中期。这时,封建制已在多数诸侯国建立起来,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实行彻底改革。而以孟轲为代表的孔丘的徒子徒孙们则大搞复古倒退、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活动。因此双方接连不断地展开了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剧烈斗争。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期。在秦王朝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过程中,以荀子、韩非、秦始皇、李斯等为代表的法家为促进全国的统一,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儒家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击退了复古倒退的复辟逆流,镇压了吕不韦反革命集团等奴隶主残余势力搞分裂复辟的阴谋活动,取得了统一全中国的巨大胜利。

1. 春秋末期少正卯等法家先驱者同孔丘的斗争

春秋时期,奴隶制开始衰落,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反对守旧,对周礼进行了一些改革,先后称霸,促进了国家的富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齐桓公的相管仲,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进步政治家。管仲(?—公元前645年)帮助齐桓公改革,他反对奴隶制的礼制,主张法治,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明法不可”(《管子·七法》)。他比较重视发展生产,他反对空谈礼义,

认为只有仓库里装满粮,人们的衣食充足,才谈得上礼义道德。(“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管子·牧民》)。他还初步实行了按土地的好坏收税的改革(“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统一行政组织,分齐国为二十一乡。这些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的一个强国。

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已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开始打破奴隶制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新兴地主阶级依靠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大量开垦私田,互相买卖,而且大批招收逃亡奴隶,把他们变为自己私田上的佃农。因此,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日益兴起。最初,奴隶主统治者不承认这些私田和它实行的租佃关系。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难,奴隶主国家被迫向私田征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收税,就是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新兴地主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当时,有些诸侯国在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公布了一些法律条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奴隶制度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贱不愆”的政治局面,提高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蔑视奴隶制的等级规章制度的“越礼”行为,如鲁国季氏公开举行只有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天子才能使用的舞蹈仪式(“八佾”)和祭祀泰山的典礼等,这是对旧上层建筑的否定。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这新旧两种制度交替的过程中,革新与守旧,前进和倒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每个阶级以至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当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代表新兴地主阶

级势力的法家先驱者积极参与反对奴隶制周礼的变革斗争,并为其大喊大叫,制造革命舆论。而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则顽固地维护周礼,鼓吹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舆论,力图扼杀新生力量。

当时,法家的先驱者邓析(?—公元前499年)在郑国大力宣传“法治”思想,为争取和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斗争。他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路线,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要求打破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他反对奴隶主儒家吹嘘的什么“德治”,认为“天”和奴隶主统治者对老百姓没有任何深厚的恩德(“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邓析子·无厚》)。他也反对把奴隶制的周礼作为衡量一切言行是非的标准,而提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的的是非标准。他还积极地为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与奴隶主统治者展开斗争。当时郑国的奴隶主贵族在奴隶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被迫颁布了一些成文法(“铸刑书”)。邓析便利用这一成文法,替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打官司(“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邓析子·叙录》)。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自己又编了一部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邓析子·叙录》),主张“循名责实”,“事断于法”(杨慎《邓析子序》)。他用各种办法,包括类似后来大字报的方式,出政治揭贴,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专横,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风潮,以致使“郑国大乱,民国讙哗”(《吕氏春秋·精谕》)。

邓析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切反动保守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拼命地对他进行攻击和迫害。最后郑国的反动奴隶主贵族下了毒手,以“诈伪之民”的罪名,杀害了邓析,并将其戮尸。

孔丘这个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对郑国反动奴隶主统治者杀害邓析

的反革命暴行拍手叫好。他对于当时没落奴隶制日趋“礼坏、乐崩”，而奴隶起义此伏彼起，新兴封建制日益兴起的大好革命形势，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它咒骂为“天下无道”。因此，他极端仇视和疯狂反对一切新生事物。鲁国的季氏推行封建的税收制度，他大发雷霆，攻击它违背了“周公之典”（周礼）。但他无法奈何季氏，只好拿帮助季氏改革的学生冉求出气。他宣布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了，并煽动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去围攻冉求。公元前513年，晋国在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铸了个刑鼎，颁布了一些成文法。孔丘听到后，竟气得发抖，拉着学生的手，痛哭流涕地说：“老百姓都可以按照鼎上公布的条文为自己辩护，怎么还能体现出贵族的高贵呢？贵贱的秩序都打乱了，怎么还能维持贵族统治的国家呢？”（“民在鼎矣！何从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丘对于一些已转化为封建主的贵族破坏周礼的行动，也感到不能容忍，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他就歇斯底里地叫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甚至连酒杯的模样与西周时稍有改变，也无限悲哀地哀叹道：“酒杯不象个酒杯，酒杯啊！酒杯啊！”（“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孔丘认为，奴隶制度是丝毫不能违背的，更不能有所变更。他顽固地维护当时摇摇欲坠的奴隶主统治，而且还梦想大开历史的倒车，全面恢复西周初期那种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局面。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切视、听、言、行都不准违背周礼，并把“信而好古”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一个劲地颂古非今，大嚷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赌咒发誓要从东方开始复辟西周的奴隶制，大搞“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疯狂反对新生事物，竭力维护旧事物；反对社会前进，力图开历史倒车，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一脉相

承，都是这样。就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刘少奇一伙就抛出反动电影《武训传》，竭力吹捧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武训，妄图用孔孟之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国民党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毛主席的深刻批判，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孔孟之道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吹捧武训，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目的。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他也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新生事物，搞复古倒退，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批孔孟之道的“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就能击中孔老二到林彪搞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的要害。

孔丘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他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思想，东拼西凑到处搜罗奴隶主的反动思想武器，泡制了一套更富于欺骗性的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他在“德治”、“爱人”、“忠恕”等骗人说教下，拼命攻击革命暴力，咒骂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变革旧制度，推翻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是“不仁”。相反，却大肆叫嚣要“猛以济宽”，用反革命的暴力血腥屠杀奴隶起义，镇压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大搞反革命两手。就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听到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成子杀了齐简公，他还痛哭流涕地要鲁哀公出兵去讨伐。

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仁”这套反动思想体系，完全是为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因此，孔丘拼命地向他的死党灌输“仁”的思想，要他的死党“杀身以成仁”，号召没落奴隶主贵族死抱着奴隶制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与新兴封建势力抗拒到底。他这种反动思想，后来为历代反动派所继承。从蒋介石到林彪，也都是用“不成功便成仁”作为他们训练反革命队伍的座右铭和“纪律”的。但是，历史

上一切反动头子从来也没有一个实行过所谓的“杀身成仁”。蒋介石逃到一群孤岛上去，靠帝国主义的保护，苟延度日。林彪也没有“杀身成仁”，而是仓惶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一心想去当一个儿皇帝。

孔丘还大肆鼓吹“中庸之道”，“礼之用，和为贵”等一套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反动理论，竭力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奴隶制度的夺权斗争。这也是以后一切反动派反对任何社会变革，推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狂叫“中庸之道……合理”，竭力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就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投降苏修的卖国主义论证的。

孔丘为了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统治秩序，还抬出了反动的“天命论”，一方面论证奴隶主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一方面吓唬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要“知天命”、“畏天命”，必须“安分守己”，一切“听天由命”。同时，他还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要人们“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服贴贴地听从奴隶主的统治，向那些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

孔丘是一个一心等待着“识货”的主子来买他的野心家。因此，他三番二次地率领他的门徒，到处游说，自我叫卖，寻求反动主子，妄图勾结各种反动势力，结党营私，扼杀新生事物，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孔丘的一生逆历史潮流而动，专开历史倒车，专搞阴谋诡计，是一个典型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寄生虫。

新兴的封建制必然代替没落的奴隶制，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鲁国著名的法家先驱者少正卯（？——公元前496年）继邓析之后，面对面地同孔丘儒家“复礼”的反动倒退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少正卯当时在鲁国宣传革新思想，影响很大，连孔老二的门徒也承认他是“鲁之闻人”。他在鲁国大力支持新兴地主阶

级破坏周礼的革新活动，为封建制推翻奴隶制大造革命舆论。他敢于斗争。孔老二招收学生，灌输奴隶主的反动思想，培养死党，他就同孔老二唱对台戏，也招收学生，进行革新思想的教育。由于少正卯讲的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得孔老二的学生也不愿听孔老二的陈词滥调，而跑去听他的讲课，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势力。孔老二对此怕得要命，他拼命攻击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然而这恰好说明，少正卯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在这样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孔老二手中无真理，便凶相毕露地诉诸反革命暴力。在他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专门负责镇压奴隶起义和新生力量的职务），并代理宰相之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竟迫不及待地杀害了少正卯。

孔丘强加给少正卯五条罪状（“五恶”），然而从这里正好说明少正卯与孔丘的斗争，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两条对立的政治思想路线之间的斗争。

“一曰，心达而险”。实际上就是说少正卯精通古今变革的道理，了解事物的变化，而且敢于造反，主张通过夺权斗争，进行社会改革。

“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说少正卯不以奴隶制周礼的规定行事，而且坚决地走革新道路。

“三曰，言伪而辩”。就是说少正卯宣传反对奴隶制的革新思想，而且善于辩论，能把革新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

“四曰，记丑而博”。就是说少正卯无情地揭露了奴隶制统治下的丑事和罪恶，而且掌握着大量的材料。

“五曰，顺非而泽”。就是说少正卯大力支持革新思想和活动，而且从理论上给以加工提高。少正卯和孔老二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少正卯的被杀害，说明

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从来就是不可调和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孔老二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大恶霸、刽子手。

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孔老二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虽然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和邓析，但法家先驱者所点起的革新火焰，是扑不灭的。在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新的更大的革新浪潮正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孔老二，却使自己声名狼藉，到处碰壁，遭到了劳动人民的群起而攻之，特别是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痛斥了他这个祸国殃民的“盗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这个“鲁国巧伪人”的骗子面目。最后，他只好在绝望的哀鸣中，活象一条断了脊梁骨的“丧家之狗”，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2. 战国初期到中期商鞅等法家同孟轲等儒家的斗争

从战国初期到中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一步全面发动夺权斗争，进行社会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由于各个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斗争的反复性，这种斗争又是接二连三的、交叉地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夺权斗争和变法革新运动。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法家和儒家，展开了夺权和反夺权，复辟和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其中主要的有以下三次：

一次是战国初期魏国的变法。孔丘死后，战国初，他的徒子徒孙们钻到各诸侯国，进行反动宣传，反对法家的变革。当时魏文侯任用法家的主要代表李悝（约公元前455—395年）为相，主持变法。而孔丘的大徒弟之一子夏就一个劲儿地教魏文侯读儒家的“经艺”，竭力阻挠和反对变法。李悝对此进行了斗争。他在经济上提出“尽地力”的主张，采

取一些措施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提高生产率，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在政治上则实行“法治”，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的原则，取消儒家维护的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生力量。为了实行“法治”，他还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后来对秦汉的封建立法具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李悝在魏国贯彻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因而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一开始就是在同奴隶主贵族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中进行的。这从《法经》的佚文中，发现有包含镇压奴隶主贵族的条款就是证明。

就在李悝变法的同时，魏国法家西门豹高举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旗帜，同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儒家有神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魏国邺（今河南安阳县）地的一些奴隶主恶霸势力，利用河水泛滥，造成灾害一事，编造了一个“河伯娶妇”的鬼话。他们胡说，河神每年要邺地人民挑选一个民间妇女投入河中，作为妻子，不然，河神发怒，水淹邺地，就要遭殃。他们妄图用这种迷信来蛊惑人心，瓦解人们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意志，破坏农业生产，并趁机骗取百姓钱财，残害妇女，破坏新兴的封建制度。西门豹当了邺的县令后，坚决推行法治，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坚决而机智地对奴隶主恶霸和巫婆进行了严厉镇压，揭露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破除了迷信。之后，他又积极领导邺地人民向自然灾害展开斗争，大兴水利，开凿渠道，引漳河水灌田，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巩固了新兴的封建制。西门豹治邺，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变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法家无神论战胜儒家有神论的一次大搏斗。西门豹是一个法家，又是一个很大的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为以后荀况、韩非等法家所继承和发扬。由此可见，法家主张变革、发展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的。而反对儒

家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也就必须同时彻底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反动思想路线。

另一次是吴起（？——公元前381年）在楚国的变法。吴起和李悝同时，早年曾同时在魏国做过官。他很会打仗，著有兵法，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后来他到楚国，为楚悼王信用，担任令尹（相当于后代的宰相）进行变法，同楚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展开了斗争。他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韩非子·和氏》）。意思就是说，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太大了，分封的世袭领地太多了，不利于封建君主和新兴地主阶级，这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针对儒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出“明法审令”，实行“法治”的革新纲领。他坚决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取消旧贵族三世以后的爵位和俸禄，并把一些奴隶主贵族赶到边远地区去开荒，使得这些骄奢淫逸的家伙狼狈不堪（“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沉重地打击了腐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楚国原较落后，经过吴起变法，政治上有进步，生产也有发展，一度成为战国初期仅次于魏国的第二个强国。但奴隶主贵族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仇视一切变革，仇视吴起所代表的法家，力图加以阻挠。楚国的一个大奴隶主贵族屈宜臼就曾搬出孔老二的那套复古倒退理论，竭力反对吴起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的变革措施。他说什么：“吾闻昔善治国者，不变故（古），不易常。今尔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有余而继不足，是变其古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他大骂吴起“大逆不道”，并以必将酿成“大祸”来威胁。吴起没有屈服，仍然坚持法家路线，积极实行变革。后来楚悼王一死，楚国的反动奴隶主贵族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用乱箭射杀吴起，又留下了一笔血债。此后，楚国就日益衰落，正如韩非所指出的：“楚不用吴起而弱乱”。

继吴起之后的再一次大的变法运动就是战国中期秦国的变法。这次

变法是由秦孝公任用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主持的。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人，早年在魏国一位法家政治家公叔痤手下办事，公叔痤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然而魏惠王没有用。所以，公叔痤死后，商鞅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最彻底的一次。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以至风俗习惯等方面，他都进行了破旧立新的改革。他的思想保留在《商君书》中。

商鞅在秦国两次公布变法措施，一次是公元前359年，一次是公元前350年，其中主要内容是：1.宣布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从法律上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2.取消“世卿世禄”制度，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新的封建等级制；3.实行重农轻商，奖励耕战的政策，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旧势力，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商鞅在法家中以重法著称，他励行“法治”，要求“法必明”，主张“刑无等级”，反对“刑不上大夫”；公开宣布对敢于违法的奴隶主贵族要坚决镇压。特别重要的是，他在秦国普遍地推行郡县制，取消了奴隶主的分封制，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路线正确，后来居上。原来最落后的秦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行之十年……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一跃而为“兵事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最大强国；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充说得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商鞅变法的成败，是关系当时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全局的关键。秦国内外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法家和儒家都把它当作斗争的焦点。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极其激烈的斗争。商鞅的一生就是与奴隶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斗争中度过的。

秦国内部的奴隶主贵族，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要跳出来拚死反抗。早在变法开始前，商鞅就当着秦孝公的面同奴隶主贵族的政

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就“要不要变法”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双方都提到了路线和世界观的高度来进行这场斗争，即主张革新前进的进步历史观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当时甘龙等象楚国的屈宜臼一样，坚持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主义，认为古代的奴隶制好得很，变不得。而商鞅则继承和发展了前辈法家的传统，提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变化发展的，时代变了，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相应变化。所以他提出了“不法古，不修今”的战斗口号，不但反对复古倒退，而且反对保持现状、故步自封。他坚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原则，认为只能革新，不能守旧；只能前进，不能倒退。他根据历史经验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了秦孝公，战胜了甘龙等儒家，取得了主持变法的领导权。

变法开始后，奴隶主贵族特别是儒家信徒，挖空心思，千方百计阴谋破坏。首先他们利用旧的传统习惯势力，煽动成千的人跑到首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企图扼杀变法。后来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头子的奴隶主贵族又针对商鞅的“刑无等级”，唆使太子驷犯法，进行刁难。商鞅不畏人言，也不惧权贵，洞察他们的阴谋以后，便非常策略而又有力地给予了反击。他说，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但太子之所以犯法，在于他的老师教育得不好。因此，应该处罚他的师傅。于是，商鞅严惩了躲在幕后指挥的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使他们无脸见人。

商鞅对付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活动，非常坚决，他处决了大贵族祝懽，并且把捕获的七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在渭水边上加以镇压，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动儒生。可见他早已“坑”了儒。商鞅也主张焚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焚书坑儒”是法家的一贯主张。这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斗争所必须采用的专政措施。对于阶级敌